

嘉绒藏区自然地理与阿来文学创作

丹珍草(藏族)

内容提要: 从作家的成长地与文学发生地出发研究文学创作,一方面便于我们从起点考察作家的创作根底、创作形态和智慧方式,另一方面,也便于我们对文学作品进行还原,考察它的发生学、形态学,及其文化元素的由来。对于阿来及其文学创作来说,川西北嘉绒藏区的自然地理和文化背景具有文学发生学意义。

关键词: 自然地理 文学发生学 阿来文学创作

“一切都发生在土地上,与土地有关或者由土地引起。”^①从地理空间的角度解读作品,研究作家的想象,我们就能发现,没有哪个作家能够超越其地理知识圈。作家对于地理空间的认知,作家对于自然的观察与表达,往往能够改变其观念与视阈,并且往往体现在其作品里。考察文学的地理要素,寻求文学发生的根源,关注作品是如何产生的,以及作家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进行创作的,研究地理空间对于作家个性及其创作的深刻影响,便于我们从起点考察作家的创作根底、创作形态和智慧方式及其文化元素的由来。正如地理学特别注意观察自然山川的构成与走向,以及自然天象的构成与演化一样,文学发生地的自然地理与地域文化对于每一个作家及其作品来说,都具有文学发生学意义。作家的出生地、移居地以及地域文化、家族文化、作家的人生轨迹等因素对于作家的创作影响往往在相互交织中产生综合效应,而地理空间和地域文化无疑构成基础性因素。

阐明文化的空间变化,就必然要探讨文化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文化地理学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文化生态学。文化生态学将人类平等地看成是生态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主要研究环境对文化的影响,以及人的文化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文化生态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化与自然环境之间因果的相互作用。这里的自然环境是指气候、地貌、土壤、植被等等诸多自然要素网络而成的整体。而人类为生存与发展,必然同自然环境发生各种各样的作用。因此,文化生态学侧重“相互作用”的研究。在文化生态学的理论基点上,我们由此也可以推导出文学

① 爱德华·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107页。

生态学的概念,藉以表达文学与自然环境、文化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弁言》中指出:“各地域各民族文化精神之差异,究其根源,最先还是由于自然环境之分别,这种自然环境的差异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并由其生活方式而影响着民族的文化精神。”^①

川西北嘉绒藏区的自然地理和文化背景对于阿来及其文学创作具有决定意义。“嘉绒”是阿来的成长地,也是其文学作品的发生地和文学王国的建构地。他说:“这片大地所赋予我的一切最重要的地方,不会因为将来纷纭多变的生活而有所改变。”^②

嘉绒藏区地理空间

嘉绒藏区,在今四川省西北边陲之地,具体说,就是云南、贵州、甘肃、青海与四川省接合部的大渡河、金沙江、岷江、黄河源头的部分地区,东起四川省成都市的都江堰和阿坝州汶川县、雅安地区的宝兴县,西至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炉霍县、雅砻江一带,南起四川雅安市石棉县和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冕宁县一带,北至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壤塘县和红原县界,与青海省班玛县接壤。嘉绒藏族聚居区最南分布到北纬 30.5 度,最北到北纬 32 度,西起东经 101.5 度,东至东经 103.2 度,南北长约 840 公里,东西长约 650 公里,总面积约为 16 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五个台湾省,超过江、浙两省面积的和。

从地理单元上看,嘉绒藏区处于青藏高原东缘的横断山脉地区——河谷纵横交错,既有大峡谷,也有海拔 4000 米以上的高山,还有河流冲积而成的台地与河谷平原。境内崇山峻岭,江河纵横,物产丰富,森林密布。大渡河盘绕折流,穿越大部分嘉绒藏区。古有“白马羊同部落多,十四嘉绒大渡河”的诗句,“十四嘉绒大渡河”说的是在嘉绒十八土司中,有十四个土司都分布在大渡河沿岸。

由于青藏高原东部地壳厚度急降,加之横断山系因受几大地壳板块的挤压而隆起呈南北走向,由此形成南北纵向、山川并行的高山峡谷地貌,这是中国三级地形大势由高而低的第一条地形过渡带。这个过渡带就是嘉绒文化带得以存在的自然基础,其地理态势有三个基本特点:

其一,边缘性。这一地带既处在青藏高原的东部边缘,又处在四川盆地及云贵高原的西部边缘。西部是冲积平原与盆地区域最接近高原区域的地带;东部则是高原区域最接近冲积平原及盆地区域的地带。

^① 转引自张岱年著《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年,第 168 页。

^② 阿来:《大地的阶梯》,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年,第 7 页。

其二,便通性。在这一地带,江河沿高原断裂带切下,然后山川并行,由高原下倾以及山川走势构成若干自然通道。

其三,屏蔽性。高山横断、深峡隔绝于高原与冲积平原及盆地之间,犹如一道屏障。这是一条具有自然阻隔作用的实实在在的界线,连绵不断的岷山、龙门山、邛崃山、大凉山等,就是一道道由北向南、横断东西的自然屏障。

嘉绒藏区所处地段的自然地理态势,决定了这个地带的历史文化无不与其自然特点相对应:

其一,这个地带是黄河流域文化与长江流域文化发生交流的最早的通道和地区之一,也是历史上古藏缅语系及其他语系的民族、族群南来北往的通道和区域。

其二,这个地带是古代冲积平原农耕文明中心对其边缘进行政治经略最早的对象之一。“藏彝走廊”的东部是最先被纳入中原王朝政治建制的地区,也是最先设置官道的地区。秦统一后,就在“藏彝走廊”东部设立郡县,并开拓了联系蜀滇的五尺道。至汉武帝时,随着武都郡、汶山郡、沈黎郡、越嶲郡、犍为郡等政治建制在“藏彝走廊”东部的设立,武都氏道、零关道、南夷道、西夷道等交通路线也在这些地区开辟出来了。

其三,这个地带是历史上族群活动最频繁、最复杂的地区,也是各种文化交流、融合异常丰富的地区。早在先秦时代,这一带就不仅有古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古代族群在其中活动,而且还有古汉藏语系壮侗语族的古代族群在其间活动,甚至可能还有非汉藏语系的诸如阿尔泰语系、印欧语系、南亚语系等诸多古代族群在此活动。秦汉以后,这个地带差不多成了汉文化与非汉文化区域的分界线,特别是在唐代以后,更是在大体上成了汉文化与藏文化的分界线。这个地带作为藏缅语族三大族群藏、彝、羌的历史文化分布地带,处于藏文化的东部边缘,又处于汉文化的西部边缘,受到汉文化和藏文化的双重影响。

其四,这个地带是一条深大的历史文化沉积带。许多曾经处于中心区域的古老文化在这里得以保存。由于这个地带的“边缘”性质,使它成为吸纳已成为过去的文化因素的特殊地带,如同费孝通所说,是“活着的历史遗留”保存地。

嘉绒藏区的地理脉息构成阿来文学创作的基础性因素

首先,嘉绒藏区的地理位置与自然环境对于阿来的文学创作具有重要意义。

从富饶的成都平原,向西向北,到青藏高原,其间是一个渐次升高的群山与峡谷构成的过渡带,这个过渡带在藏语中称为“嘉绒”。阿来讲述的许多故事都发生在这个宽广的“过渡带”上。以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空山》系列、《格萨尔王》和地理文化散文《大地的阶梯》、非

虚构写作《瞻对》为代表,阿来的作品几乎都是以青藏高原特别是川西北嘉绒藏区的地理空间为背景,是阿来对处于地理和文化“过渡带”的故乡——“嘉绒藏区”的“深描”。

在《永远的嘉绒》一文中,阿来对嘉绒的地理空间做了形象的描述:

嘉绒,是藏民族大家庭中一个部族的名字。

嘉绒也是一个地区的名字。

我在一篇小说里说:这个地区在行政上属于四川,地理上属于西藏。

嘉绒在藏语中的意思,就是“靠近汉区山口的农耕区”。这个区域就深藏在藏区东北部、四川西北部绵延逶迤的邛崃山脉与岷山山脉中间。座座群山之间,是大渡河上游与岷江上游及其众多的支流。出四川盆地,从大渡河出山的河口,或岷江出山的河口一直往西往北,这两条大河像是一株分岔越来越多的大树的庄严的顶冠。

最后,澎湃汹涌的水流变成了细细的一线,如牧人吹出的笛音的清丽与婉转。那些细细的水流出自于冰川巨大而有些麻木的舌尖,出于草原沼泽里的浸润与汇聚。

那种景象出现时,双脚已经穿过了数百公里纵深的嘉绒大地,登上了辽阔的青藏高原。

在大多数人的想象里,那里才是异域风光的开始。

长期以来,大家都忽略了青藏高原地理与藏文化多样性的存在。忽略了在藏区东北部就像大地阶梯一样的一个过渡地带的存在。

我想呈现的就是这被忽略的存在。她就是我的家乡,我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故乡。^①

阿来就出生在这片构成大地阶梯的群山中间,在那里生活、成长,直到 36 年后才离开。他说:“我更多的经历与故事,就深藏在这个过渡带上,那些群山深刻的褶皱中间。”^②

文化从来与地理相关,不一样的地理往往意味着一种新的精神启示与引领,复杂多变的地理往往预示着别样的生存方式,构成多姿多态的文化,而任何一个地理空间都不只仅仅意味着一个地理位置、物理空间,而是地理与历史、文化的多维存在,是一种心理空间,一种更为多样化和独特生活方式的象征,是渗透了历史的、文化的、政治的有意义的立体的“地图”。

^①《阿来文集·诗文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年,第 144-145 页。

^②阿来:《大地的阶梯》,第 25 页。

“人之初”的原初记忆和文化基因,有时可能影响作家一生的文学追求和文化理想。在《尘埃落定·后记》中,阿来说:“因为我的族别,我的生活经历,这个看似独特的题材的选取是一种必然。”^①阿来走遍了自己的家乡——阿坝高原,造访过几乎每一处寺庙与遗址,对本部族本区域的地理、历史、文化有深入的了解。在写作中,阿来不断地深入故乡的群山,在高岭深谷、冰川牧场间进行寻访与踏勘:县城、小镇、乡村、寺庙、古堡、土司官寨遗址和已经完全废弃的古驿站……在宽广的过渡地带,美好与伤痛都深藏在这些群山深刻的褶皱中间。阿来不是在写异乡异闻,而是从“嘉绒藏人”的视角观照世界,从“我”出发看待本土文化和异质文化,驻足于两种或多种文化的“中间地带”感受文化的冲突和融合。阿来说,《尘埃落定》的写作其实是身在故乡而深刻的怀乡。阿来在小说里传达了不同民族之间文化交互杂糅的信息。《尘埃落定》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发生于四川西北部的汉藏交界地带的“嘉绒藏区”,一个成都平原与边地藏区的接壤处,一个历史接合部社会阶段接合部民族接合部的故事,为读者展示了一种不同的文化空间、不同的生存方式和不同的生命智慧。

第二,地理空间及其自然脉息构成阿来精神世界的底层成分。

在写完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后,阿来把作为这部作品背景的地区又重走了一遍。他说:“我需要从地理上重新将其感觉一遍。”^②这是很有意味的。阿来的文本,对嘉绒大地的地形地貌、山川风物、气候植被有大量的景观描述。但景观描写中表达的却是有关这片大地的一切心灵感受,展示的是一幅幅与自然气脉息息相通的心灵图景。我们从阿来的所有作品中,都能感受到嘉绒大地的自然地貌和自然风物对作家精神世界的引领。阿来说:“我在群山中各个角落进进出出,每当登临比较高的地方,极目远望时,看见一列列的群山拔地而起,逶迤着向西而去,最终失去陡峻与峭拔,融入青藏高原的壮阔与辽远时,我就把这一片从成都平原开始一级级走向青藏高原顶端的一列列山脉看成大地的阶梯。”^③在某种程度上,嘉绒的地理脉息对阿来心灵世界的建构甚至超过了人文历史。构造雄奇的地理骨架、悠久复杂的历史空间和多元共生的族群文化链建构了一个部族共同的精神空间,也构筑了阿来的心灵世界。

新文化地理学认为,景观并不是如传统人文地理学(即文化地理学)所定义的那些我们

① 阿来:《尘埃落定》,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425页。

② “不是第一次了,写完一部作品后,总要重新游历一遍作为故事背景的那片大地。有些时候,这种游历会有一个直接的结果。《尘埃落定》之后,我就曾经重新游历了当年嘉绒十八个土司的故地,四川省阿坝州和甘孜州的部分地区,不意间又写了一本叫《大地的阶梯》的书,一本地理、文化、历史交相辉映的书,当然也可以说是一本芜杂的书。更多的时候,则只是行走与回味,也许,正是在这样的游历中,新的故事又在心中生长了。”(引自阿来博客文章《我的格萨尔故乡还愿之旅》,http://imalai.blog.163.com/blog/static/13220786520091093278137/,2009-08-14。)

③ 阿来:《大地的阶梯》,第1页。

在地面上看到的风景、景象或一片土地,而是看的方式。

阿来喜欢不间断地漫游,从马尔康县的藏族村寨卡尔古村开始,到梭磨河、大渡河、墨尔多神山、大小金川、若尔盖草原……在漫游中写作,是阿来的生活方式之一。《大地的阶梯》就是阿来缘自自我心灵深处的自然与文化依恋情结而完成的一次寻根之旅,带有强烈的寻根式家园情怀。他说:“嘉绒大地,是我生长于兹的地方,是我用双脚多次走过的地方,是用心灵更多次走过的地方。”^①在漫游中,阿来把自己融入了那片雄奇的大自然,他自觉地扮演了一个文化人类学者的角色,“坚定地要以感性的方式”,“以双脚与内心丈量故乡大地”,在群山中各个角落进进出出,探寻嘉绒部族的历史以及随着历史的变迁而湮灭于荒山野岭间的历史中的文化。阿来试图通过地理考察,以寻幽探微的方式,以真切的自我体验穿越空间和时间,捕捉那些附着于地理之上在历史的天空中早已逝去的“遥远星光”。^②民族志和随笔体具有的真实性与可读性,引领读者沿着大地的阶梯,走上梯升的群山,走上世界屋脊,领略藏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中一个独具特色和魅力的文化地带——嘉绒藏区。

第三,嘉绒藏区的地理空间与地域文化铸造了阿来的空间感与空间意识,也对其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藏人生活的青藏高原山川地貌富有罕见的地理个性与瑰丽的审美想象,这种地理个性深刻地影响着藏族人的感觉、意绪、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当藏族作家、诗人歌唱他们生息的故土时,作为自然景观反映的艺术世界必然打上青藏高原地理的烙印。由地理个性造成的审美想象对于藏族作家来说,是民族整体性的独特因素之一,藏文化、藏文学同时兼有了自然与人文的双重魅力。

穿越空间与时间,藏人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空间意识。千年不化的雪山,望不到边际的荒原……传统的藏人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恍如隔世的世界屋脊之上。雪山和高原像栅栏一样把他们阻隔于外部世界之外,使其孤悬于地球之巅。置身于这样巨大的自然空间中,在自然施予的旷远神圣与残酷威压中,无论是个体还是集体,都极易感受到空间的孤独、丰富与广阔。单纯的地理空间感让人自身的存在显得无助而渺小,藏人对宗教的执着与痴迷,以及复杂而丰富的感受或许是潜意识里对这种孤独感的反抗。但是,如果我们把空间看作是人与神灵沟通的心灵空间,空间又是丰富的、复合性的和感性的。

藏传佛教的空间观念是轮回,在这种观念支配下,宇宙之轮往复循环。在过去、现在、未来之间,在生与死之间,生命之轮永恒旋转。时间的流逝只是一种表象,只会影响生命的外

① 阿来:《大地的阶梯·后记》,《大地的阶梯》,第 273 页。

② 阿来:《就这样日益丰盈》,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 年,第 186 页。

观,任何变化都不会影响生命空间的本质。这种时空观完全排除具体历史事件的意义,每一个新的事物都是在回溯旧的不变性。

对于“嘉绒藏人”阿来说,空间感与空间意识几乎是与生俱来的。这种感觉或意识,除了地域文化的陶养,更多的是地理空间的模铸。

嘉绒藏人主要聚居在川西北高原的大、小金川流域一带及岷江流域以西。川西北高原是康藏高原的极东边缘地带,北有岷山山脉,南有邛崃山脉,彼此纵横交错,岷江与大金川纵穿高原的两侧,而以“四土”地区的鹧鸪山为分水岭。川西北地区除极北的若尔盖、阿坝等是草原外,其余皆是群山重叠的峡谷及冲击而成的台地与河谷平原,土地十分肥沃。这些地方海拔一半约在2000米,一半在2000米以上,嘉绒藏人就居住在这群山重叠的峡谷间。阿来说:“拜血中的因子所赐,我还是一个自然之子,更愿意自己旅行的目的地,是宽广而充满生机的自然景观:土地、群山、大海、高原、岛屿、一片树、一丛草、一簇花。更愿意像一个初民面对自然最原初的启示,领受自然的美感。”^①

嘉绒藏区的自然地貌、山川风物是极具心理张力的地理空间,在这样的空间中,时间的、物质的、思维的、感觉的、想象的一切都深刻地打上了空间的烙印。这个由群山和峡谷构成的过渡地带,总是处在不断的“上升与陷落”之中。生存在这些“群山深刻的褶皱中间”,历史的兴衰、人事的浮沉、生活中的幸与不幸、精神上的荣与辱……似乎都可以用地理上的上升与陷落来表述。时间长河中的历史和文化在此呈现为一种折叠状态。这是一种真切而深刻的感受:“作为一个漫游者,从成都平原上升到青藏高原,在感觉到地理阶梯抬升的同时,也会感觉到某种精神境界的提升。但是,当你进入那些深深陷落在河谷中的村落,那些种植小麦、玉米、青稞、苹果与梨的村庄,走近那些山间分属于藏传佛教不同流派的或大或小的庙宇,又会感觉到历史,感觉到时代前进之时,某一处曾有时间的陷落。”^②

由于处在汉、藏两大地理、文化板块的接合部,在缓慢的历史进程中,嘉绒藏区往往被边缘化甚至被遗落,时间因而被空间所悬置。与生命历程相关的个人或族群记忆,在那片空间中,也是一种折叠状态。作为“嘉绒藏人”,阿来穿行于不同地理文化空间之间,对空间具有更加深切的体验。在阿来的很多作品中,对本土景观的描叙,高旷悠远,壮美纯粹,藏域故事因而与别处有了区别。

第四,在探讨阿来的空间化书写时,“过渡地带”是一个无法回避而又十分有意味的话题。

① 阿来:《大地深处的咏叹——游思集题记》,《看见》,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

② 阿来:《大地的阶梯》,第7页。

“过渡地带”是处于两个地理空间之间的由此及彼而又非此非彼的间隙或中间地带,地理上的“过渡地带”往往与文化上的“过渡地带”密切相关,也与民族、宗教、语言、历史、政治、经济、道德以及权力、知识、话语权、心理、情感等密切相关。因此,地理空间也是一种人文区位。美国学者派克在他的“人文区位学”里,把人文世界分为四个层次,基层是和动植物等同的,称之为区位层或生物层,往上一层是经济层,再上一层是政治层,最高一层是道德层,这几个层次像是堆成了一个金字塔,区位层是基础,道德层最高。^①“嘉绒藏区”处在一个特殊的人文“区位”,在这个地域空间里,文化的多元性,尤其是族裔身分的多元性决定了这个文化空间是多维的而不是单一的,是杂糅的而不是纯粹的。

“过渡地带”也是不同地理、经济、政治、文化、语言板块的“边缘地带”,是一个汇聚了多种矛盾的场所,具有诸多“边缘性”特征。一方面,“边缘地带”夹在两个权力空间之间,超脱于两种权力斗争之上,游离于两种文化的秩序之外,是两种政治、两种语言、两种文化之间的“公共空间”和两个经济区之间的“转运港”,具有“三不管”的超然色彩。另一方面,“边缘性”也是“一种长远以来被迫接受的状态。它代表了人家对你的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对你所做的事视若无睹”^②。处在两大权力中心之间的“边缘地带”,一直以来都面临着两种命运或两种状态:一是在两种或一种政治势力削弱或无暇他顾的时期,“边缘地带”滑出了中心或主流视野,被忽视甚至被遗忘,自生自灭,形成了另一种政治上的边缘。如《尘埃落定》中的土司制度,就处在这样一个时代。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土司制才得以在不同权力空间的“间歇”中延续。一是在两种或多种政治势力因为强大而不断对外扩张的过程中,“边缘”又往往成为各种政治、文化势力争夺的中心。如唐朝时期,嘉绒地区就一直处在吐蕃王朝和唐王朝的激烈争夺之中。

阿来的家乡——“嘉绒藏区”处在藏地三区(卫藏、安多和康区)多个藏族支系的接合部,处于藏族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接地带,也处在藏、汉文化生态板块的“接壤地带”,以及费孝通所说的“藏彝走廊”上,不同族群文化(藏、汉、彝、羌、纳西、回等)之间的杂交与互动是“嘉绒藏区”文化的基本特色。在地理和政治关系上,“嘉绒藏区”是一个过渡地带,是“内地的边疆”,又是“边疆的内地”。嘉绒藏族在族源构成、宗教派别、语言使用、文化传承体系等方面,都充分体现了地理和文化过渡地带的复杂性、丰富性、流动性和敏感性。阿来就出生、成长于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生态区,在“异质文化”之间穿行,“在两种语言之间流浪”。他多重的文化背景以及既在局外又在局内的感受,都来自其成长地“嘉绒藏区”的空间背景和社会生

^① 转引自《费孝通九十新语》,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年,第70页。

^② 梁秉钧:《引言》,《今天·香港文化专辑》1995年第1期。

活。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阿来的汉语创作天然地获得了语言文化的双栖姿态,并从一开始就被天然地置于多元文化与多民族文学比较的视野中。

“嘉绒藏区”这种文化的“过渡地带”或“中间地带”,与爱德华·萨义德提出的“中间状态”、霍米·巴巴提出的“间质空间”(又译作“第三空间”)有些相似,这个空间是由其他空间的边缘组成的,来自各个空间中心地带的力量在这个由边缘构成的空间中呈现出不同力量的对比与张力,而生存于这个空间的人,往往既游离于各个族群文化空间的中心,又因血缘、习俗和心理皈依等因素而与各个空间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每个“过渡地带”的社会习俗、文化、信仰、思维方式等都带有文化接合部的多元性、丰富性和互动性。“过渡地带”的空间背景与多元文化传统也使文学创作呈现出多种文化元素共存杂糅的特点。动人的故事总是容易发生在文化交汇的地带。

“嘉绒藏区”的自然脉息与地域文化赋予阿来的族群文化心理积淀无疑成为他的一种文化本能和创作资源。“嘉绒藏人”的文化视角和文化心理是阿来观察世界和感受世界的始发之地。我们只有进入阿来的叙事文本生成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中,才能感受并了解中华文化和藏文化多样性存在中“嘉绒藏区”这个特殊族群的历史变迁、宗教信仰、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族群性格等。

(丹珍草,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周翔】